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南京条约



## 一、倾斜的谈判桌

对于龙的传人来说，“八·二九”是个极为苦痛的日子。

150年前的这一天，南下关江面上聚集了80余艘英国军舰。所有舰只都高悬大不列颠国旗，甲板上站满身着蓝紫色鲜艳新装的英国官兵。他们挥动着手中的武器，尽情地高呼：“女王陛下万岁！”远道而来的英国人为什么这么颠狂呢？原来，就在这天中午时分，清政府代表耆英、伊里布、牛鉴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一艘名叫“汗华丽”号的军舰上签署了一个让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的条约——《南京条约》（因南京又称江宁，故《南京条约》也称《江宁条约》）。

其实，英军这种歇斯底里的庆祝胜利的场面，是事先安排好的。因为那天在“汗华丽”号上进行的中英签约仪式，仅是履行手续而已。在此之前，谈判桌的天平早已倾向英国一方。

“对条文的字眼或措辞一点吹求都没有，为欧洲的外交家们所如此尖细地钻研和谨慎的考虑过的条文，只占去（清政府的代表们）一刹那的注意力。他们的所有心事都集中在一个主要的目标上，就是要我们赶快撤离。这心事之强烈，已到了无法掩饰的程度。结果，差不多是异口同声地表示同意，他们恳求全权大使撤走舰船。”——这是摘自当年英方谈判随从利洛笔下的一段记录，它维妙维肖地勾勒出其时清廷谈判代表耆英、伊里布、牛鉴等人急于求和的心态。

有位学者还指出：这次谈判显然是处于英国武装的优势之下，不得不听命于需要的支配。

这话一点儿也不假。

那是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秋末，英军连续攻陷了浙江三城：定海、镇海、宁波。

为了加强防御，坐在龙椅上的道光皇帝任命奕经为扬武将军，赴浙江应战。

奕经虽是皇室要员，但却是一个不中用的草包。在南下途中，一路游山玩水，沉缅酒色，视战争为儿戏。

1842年1月25日，他忽然做了一个梦：英军统统上船逃出了外洋。

这是一个“吉祥的征兆”！——他周围的一帮马屁精纷纷阿谀奉承道。作为参赞大臣的文蔚，竟附和说自己也做了一个同样的梦。

于是，这位皇室的金枝玉叶“夜不能寐”，决意实现梦幻中的“胜利”。

3月10日，奕经下令发动总攻，企图一举收复定海、镇海、宁波三个城市。

此刻，远在京都的道光皇帝也做着美梦，表示若“待捷音”，一定“立颁懋赏”。

然而，实现梦幻中的“胜利”谈何容易。一经接仗，清军便败下阵来。

恰在这时，有位名叫钟人杰的又在湖北崇阳发动了会党起义。清政府顿感“外患未除，内讧又起”，皇帝马上告诉他的大臣们：“攘外必先安内，禁暴民即以爱民。”

3月21日，浙江巡抚刘韵珂乘机呈上一个“十可虑”的奏折，除极言英军战斗力强大外，重点报告了清军漕粮难征、财政紧迫的情况，并点明无法再与英国打下去，要求皇上拿主意乞和。

刘韵珂的这个奏折正中清廷的下怀。

3月28日，道光皇帝调广州将军耆英改任杭州将军，并重新起用上一年革职的伊里布同赴浙江与英军议和。4月7日，又给耆英加上一个钦差大臣的头衔。

对于耆英来说，这无疑是天赐良缘。因为他是当时有名的主和分子。当皇上让他南下“设法羁縻”时，他竟脱口说道：“好了，天意回转，另有办法了。”

他有什么办法呢？他的办法就是投降！

然而，清廷越想乞和，英军越是嚣张。

在英军看来，长江下游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而南京又控制着长江、运河两大水道，江南的大量漕米和税银，都要汇集到南京。因此，如果占领南京，就等于掐住了清政府的咽喉。所以，英军拒绝议和，决定按原计划入侵长江，直扑南京。

5月18日，英军攻陷江浙海防重镇乍浦。

耆英闻报，当即向清廷奏称：我军“万难再与争持”，“舍羁縻之外，别无他策”。

6月，英军进犯长江。

其时，江南提督、年近七旬的老将陈化成，率领水陆官兵5000余人守吴淞炮台，抗击英军。在激战中，他身负七伤，仍亲自燃炮，轰击敌人。

但可悲的是，由于扼守侧面的两江总督牛鉴等临阵脱逃，放弃炮台，致使陈化成腹背受敌，最后血染战衣，以身殉国。

6月16日上午，英军攻陷吴淞口。

同一天下午，英军又占据了宝山。

时隔三天，亦即6月19日，上海也沦入敌手。

英军下一步进击的目标是哪儿呢？

在京都，人们盛传英国赴上海之后的下一个目标是天津和北京，并且出现了有一支扩大的舰队向北行驶的流言。

于是，不少大员纷纷到平谷县（距北京150里，四周都是山）等地置购房产，迁移家眷，准备逃难。道光皇帝也急忙把驻守在长城外的军队召回防守山海关。其他军队则驻扎在喜峰口——这是从华北平原通向热河的重要通道。6月28日，道光皇帝还任命军机大臣赛向阿为钦差大臣亲赴天津，以扼守通向京都的门路。

然而，“这个政府好像就不曾料到我们会进攻这个被选定的重要据点（指镇江），它如此全神贯注地准备抵抗意料之中的对京城的进犯，竟完全忽略了长江防备，待到发觉，悔之已晚……”——一位名叫欧彻伦尼的英方参战者这样得意地说道。

欧彻伦尼看出清军忽略长江防务是千真万确的。

其实，自吴淞之战以后，整个江南地区的防务就处于瘫痪状态之中。钦差大臣耆英和伊里布此时不仅力主和议，而且唯恐加强防务会给他们的议和活动带来不利影响。因此，一方面让常熟、昭文、通州、靖江、江阴、丹阳沿江各州县，“馈送英夷牛羊，勿与构怨”；另一方面又派白含章、陈志刚等人于英军接洽议和。两江总督牛鉴则自吴淞口落荒而逃后，先至苏州，后抵镇江，直到南京才不得不停住脚。

用时人梁廷枏的话说：鹅鼻嘴、圖山、焦山、金山等长江“诸险，全未

设备，而近水可以设伏之丛沟荻港，皆虚为兵炮。”

这样一来，英军从长江口到镇江，简直如入无人之境。

当时，镇守镇江的清军只有 2400 人，而来犯英军则达 1.2 万人。

在英军看来，镇江城可谓垂手可得。

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当 7 月 21 日战斗打响后，来犯英军遇到了顽强的抵抗。柏纳德在《“复仇神”号轮舰航行作战纪》一书中这样记述道：

“第 55 团和马德拉斯本地步兵第 6 团和来复枪队一道……，争相攀登云梯；不过满军（即清军）也在那里拼命作战……，步步为营，誓死抵抗。

许多参加这次战役而亲眼见到满军坚决作战的人，都能够讲出一些故事。很多满兵直向我军的刺刀冲上前来。有的时候，满军冲到我军警卫哨来，将我方士兵捉住，然后抱起来一起跳下城墙去。还有一两次，满军士兵在被我军刺刀刺伤以前，居然能够把我方士兵摔下城墙去。满兵的肌肉很发达，当他们穿上宽阔制服时，更使人看出他们的强健。他们在和我们用大刀拼搏或作短兵相接的肉搏战时，总是不畏缩的。……

那天早晨，约在 10 点钟左右，‘布郎底’号所属的几条小船，奉命重新载上一部分炮兵队和东印度炮兵并带两门榴弹炮，前去援助陆军向西门进攻。……中国军队发来的炮火，曾对我方前进的船只给以致命的打击。仅在 10 分钟左右的战斗过程中，我方 16 号海员和 8 名炮兵都受了伤。……

在第三旅沿着城墙脚下集合的时候，一队满兵突然向其打来激烈的炮火，因此，我方两名军官阵亡、两名军官受伤，还有几名士兵被打倒在地。……

当我军行经旗营内一条狭窄街道（在一个小城门后面）时，一队满兵忽然从街的对面向我军打来几枪，而且看来他们要在那里进行极其坚决的抵抗。……

就在有组织的抵抗停止许久以后，我方几位军官还得用大刀来防卫他们的生命。马德拉斯本地步兵第 14 团某军官，曾和 3 名满兵进行了一次短兵相接的肉搏。……

镇江府是满军认为一个坚强的据点。……他们难以忍受失败，不能容许这班来历不明而且可恶透顶的野蛮人，来褻渎他们的家园，来践踏他们的土地，因而每一家房子里，都有它的殉难者。”

镇江城破之后，英军兽性大发，纵兵烧杀。一个侵略分子供认说：“只要是真实的回忆，就可觉得这颗心很难说是有人道的了。但即使是心肠最硬、资格最老，以杀人越货为生的人，看到这种悲惨景象，也不能无动于衷的。”

镇江失陷以后，道光皇帝已拿定主意，彻底屈膝投降。当有人奏请把沿江商民盐梟组织起来抗敌时，他竟朱批道：“无人，无兵，无船，奈何，奈何！”

7 月 26 日，也就是道光皇帝接到镇江遭难的详尽报告的那一天，他命令耆英和伊里布：

“前往京口（镇江对面）以适当方式处理一应事务，万一该逆定要进入省会（南京）进行骚扰，则准许该员暂且经由谈判试予羁縻。设若该夷犹疑不定，则告知他们已有谕旨下颁，着令耆英和伊里布专门负责此一事物……。”

所谓“羁縻”，实际是投降的代名词！

7 月 31 日和 8 月 1 日，耆英在南京又接到来自宫中的两封机密信，要求

他遇事尽可“便宜行事”，不能“稍涉游移”，务必“从权办理”！

此刻，辅佐道光皇帝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更公开提出：

“兵兴三载，糜饷劳师，曾无尺寸之效。剿之与抚，功费正等，而劳逸已殊。靖难息民，于计为便。”

尽管耆英和伊里布向英军头目璞鼎查频送秋波，但英舰仍按原计划于8月14日驶抵南京下关。

当英军兵临城下之际，清军压根儿未作布防。因为在耆英、伊里布、牛鉴看来，南京是英国侵略者指定的议和地点，他们怎能在这里与对方搞僵呢？

就在英舰驶抵南京下关的第二天，英军就给两江总督牛鉴发出了照会，要求清军马上“缴银300万元，为大英战费之项”，只有这样，英军才保证不攻击南京城，否则“本军门等亦碍难稍为戢兵，仍当力行争仗”。

其时，璞鼎查又声称，清廷的议和代表必须具有充分的权力来“独立解决问题”。否则，就不与之接触。

耆英则马上答复道：英国人所说的“全权”一词与自己担任的钦差大臣的头衔，并没有什么差别。

8月7日，耆英和伊里布接到一道上谕。内称“该夷等所议与所请之事，若在情理之中，卿等当可允准。卿等尚应讲明，在卿等共同满意地商榷，并向圣驾奏过之后，尽可付诸实施，无须再有犹豫……。”

从这个诏书中，耆英取得了英人所说的“那种广泛的议和权力”。

英方首席翻译马儒翰验过耆英的“钦差”任命状后，同意与之“和平谈判”。

用英人的话说，耆英和伊里布当时的谈判策略是委派低级官员“去与英军头目会晤，观察其口气与措辞如何，而后再派较高等级的官员去谈实质问题”。

8月8日，伊里布和牛鉴商议后，首先派出五品军功顶戴张喜、外委陈志刚及谢继超、刘建勋等5人来到英舰“汗华丽”号上与英方代表总管领事麻恭、译员马礼逊、罗伯聃、郭士立等人交涉贸易和赔款问题。

有趣的是，张喜的军功顶戴是临时赐予的。耆英给皇帝的奏折中曾这样透露：“值此吾人派员往夷船交涉之时，最要者厥在所派之人应为熟谙夷情之人，可望其有裨事体之人。如今奴才等商议此事，不得不令张喜暂着军功顶戴……如此夷人始不敢轻视于他。”

陈志刚则以与洋人打交道而出名，人称“临时的使节”。

当时，英方开列的条件主要有三点：“即赔还所夺之货物（指鸦片），及年来之战费，一也；其两国官员，嗣后以友理相待，平行通交，二也；割让海岛，以给英人居住贸易，免致再酿争端，三也。”

8月12日和13日，张喜等人与麻恭等在南京北门仪凤门外净海寺内又会谈了两次，但毫无结果。

傲慢的璞鼎查对这种东方外交传统中利用下属而不牵涉自身的做法大为恼火。他强烈地斥责了这种拖拉的策略，要求清方改派更高的官员，否则将再度使用武力。

璞鼎查的威胁果然马上见效。当8月14日继续会谈时，江苏按察使黄恩彤、四等侍卫前吉林副都统咸龄出场了。英方谈判随从利洛这样记述道：“我们在庙（指净海寺）的广大的入口被一群中国官吏——白蓝顶以至铜顶——欢迎进去。和我们不同，他们穿着绣花的丝绸或织花的薄纱，剪裁既美，

质料又佳，若在我国，非妙龄美女，不足以着此。他们向着我们鞠躬致敬，执礼甚恭。等我到了大厅，黄秘书（即黄恩彤）与满洲将军咸龄站在门外，肃我等入室。马礼逊将我们一一介绍，然后我们坐在能坐两个大胖子的椅子中……

等我们将草约议好之后，用中英文缮写两份，一份由中国官吏带回，一份由麻恭带回，以供璞审阅。当我们在起身要走的时候，这位老满洲将军说道：‘条件太苛了……两国间的战争，胜负往往决定于机会，但败方必须偿付胜方’”。

这个利洛看出，中国官吏当时一点儿也不隐饰急于求和的心情。

到8月17日，无条件的投降丑剧进入尾声。张喜这样写道：“张攀龙取来该夷议覆和约草稿，前半本系汉文，后半本系夷文，于前议三大端之外，又增十数条，共载十三条”。

既然投降的丑剧已进入尾声，耆英、伊里布、牛鉴很乐于在这个时候拜访自己的对手璞鼎查，以便最终完成议和的使命。

8月20日11点过后，这三名皇室代表穿着笨重的满洲靴应邀来到“汉华丽”号英舰上。“他们生怕有危险，所以举动很缓慢。当英人献上咖啡、茶酒、糖果、樱桃、白兰地等食品后，耆英等人则赞不绝口。”

在这次会见中，这三位清廷代表竟然闭口不提有关条约的事，而是与璞鼎查讲了些涉及音乐、武器等不着边际的废话。

时隔三天，亦即8月24日，璞鼎查又回访了耆英等人。

就在这一天，耆英接到皇帝“不准在于福州通市，即万不得已，或于泉州附近，酌与通商”的上谕，遂派员与英方商议，结果遭到马礼逊的拒绝。

8月26日，璞鼎查等人又入南京城与耆英再次会谈。耆英为了以自己的“诚心”取悦侵略者，竟然丑态百出，给后人留下了笑柄。

还是那位英人利洛观察得仔细，他又这样描述道：“今天是被指定亨利·璞鼎查与钦差们磋商并最后决定条件内容之日。”

……

当我们入座之后，音乐又起，似比我们第一次听到的较好，在我们吃饭时，一直未停。年青的戴白顶子的官吏们端茶敬酒，捧上点心，几位钦差通过翻译和大臣谈天。

各种的食品如细肉馅的点心、猪肉竹笋、肉丝汤面、猪耳和别的许多奇怪的菜品，盛在小磁碗中，置于银碟之上。一样一样地端上来，我们吃的愈多就愈引起观众的赞叹，但人类的食量究竟有限，最后耆英为了表示致敬，要求亨利爵士将嘴张开，用灵巧的手法扔进几块大的糖饅梅子。我永远不会忘记亨利爵士发现抗议无用，只能忍受的表情，同时我更不会忘记耆英就站在亨利爵士之前，如像一近视眼老太太穿针的姿势，将糖果拿在手中向内扬的姿势。

在这以后侍役们把桌子收拾干净，公事由此开始。

用中英文写出的我方要求，又重新被朗读一遍。除了最初中国方面对于我方要求占据舟山，以作为中国交纳二千一百万元赔款作为保证，表示不同意，并要求将福州府不要作为通商口岸外（后来连这一点也屈从了），其余条款完全同意。”

本来，按照双方的约定，拟于8月27日举行签字仪式。但由于伊里布生病，只好推迟到29日。

据透露，伊里布早就患有肝病。到会谈后期，旧病复发，体温‘时冷时热’。8月26日那天，他请求英国医生伍斯南大夫替自己看病。伍斯南给伊里布开了药方，并要求他派一位随从到英舰‘皇后号’上取药。伊里布的管家张喜去执行这个任务，但他在英舰上喝了酒，把服药的说明书弄丢了。可他又不肯向主人如实禀报，而是撒谎说把‘全部药丸和药水’一次服下去。结果，伊里布的病情进一步加重。到8月29日签字那天，伊里布‘被抬进舱中，安置于沙发之上，在整个会见期间，一直躺在那里’”。

对于侵略者来说，8月29日签约的场面确是激动人心的。利洛这样炫耀道：“这是一个光荣的景象。离着中国最大河流口200英里，在它的故都的城垣之下，在一个具有74座炮位英国军舰的船舱内，中国第一次被迫缔结的条约，并由三位最高的贵族，在英国国旗之下代表天朝签了字。”

这个签了字的条约，就是《南京条约》！也称《江宁条约》、《白门条约》或《万年和约》。

这个在炮口下威逼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共计13款，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五口通商。该约第二条规定：“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这五处港口，即所谓通商口岸、通商码头或条约口岸。

2. 割让香港。该约第3条赫然写道：香港由英国“常远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3. 赔偿巨款。该约第4、5、6条分别规定，中国赔偿英国烟价、军费等2100万元，其中鸦片费600万，商欠300万，军费1200万。这笔巨款全用中国“白银支付，并且装运到伦敦或加尔各答，……在那里重加铸造，每一银元约可得四先令六便士。”

4. 协定关税。该约第10条规定：“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

5. 释放卖国汉奸。该约第9条规定，凡是犯有叛国罪行的买办奸人，“均由大皇帝俯降谕旨，誉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显而易见，英国从这个条约中得到的是种种权利，而无需尽任何义务；中国所承担的全是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

不是么？首先就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个通商口岸而言。乍一看，国与国之间进行正常贸易，以有易无，经济互通，岂不是件两全其美的事。但后来的实际情况表明，当时中外通商是在入侵者要把中国变成它的原料供给地和推销剩余产品市场的前提下进行的，根本谈不上平等互利。由于中国失去了主权，当时中国的门对谁开，开多大，已不是由中国政府作主，而要洋大人说了算。更何况，到中国各通商口岸做“生意”的多半不是商人，而是些穷凶极恶的海盗和无赖。一个外国学者这样记述道：“上海开埠以后，无恶不作的亡命之徒从四面八方聚拢在这里。其中有逃亡的水手，有遭贬斥的醉鬼，有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投机破产者，有来自香港与澳门的罪犯，也有来自菲律宾等地的埠头流氓。”即便是真正的通商，也是入侵者单方面受益。对于西方列强来说，其工业制品尾随大炮叩关而入，二三十年以后，洋布、洋绸、洋伞、洋油等名目繁多的“洋货”，“通行各口，销

入内地”，致使中国大量白银外流，“华人生计，为其所夺”。

正因为这种开放、这种通商能使入侵者单方面受益，所以，若干年后，西方列强又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放了牛庄、登州、台湾、汉口、九江、南京、烟台、天津、重庆等一大批沿海和内地城市为商埠。

强占香港则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

英国之所以要强占香港，是企图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控制中国。用英国外交大臣巴麦斯顿的话说，“香港是插入中国领土的一个楔子，同中国大陆的关系正如瓦特岛之于英国，长岛之于美国”一样。有了这个“楔子”，大不列颠的舰队便可在那里停泊，以对中国实行炮舰政策；有了这个“楔子”，英国烟贩子便在那里囤积鸦片，以向中国大陆进行走私；有了这个“楔子”，一切非法活动都可以在英国的公开保护下进行。

勒索赔款则直接导致了中国的进一步贫困化。

其时那笔 2100 万元的赔款，相当于清政府全年财政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在此后的四年中，清政府财政支出的十分之一被用来支付这笔巨款。

至于协定关税一条，又剥夺了中国自行规定关税的主权。

按理说，如何征收进口货物的关税，完全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事，而如今却需要“议定”。也就是说，日后中国增减进出口货物税率，非经英方同意不可。这就为外来商品侵入中国提供了世界上少有的便利条件。更严重的是，协定关税还使中国海关失去了保护本国工农业生产的作用。若以“关税制度是发展国家工业的主要工具”的观点看，协定关税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工业无法起飞。

《南京条约》是勒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第一根绳索，或曰：戴在中国人手上、脚上的第一副手铐、第一副脚镣！——有的学者这样形容道。

这话一点儿也不假。《南京条约》恰似一根绳索，勒得中国人民喘不过气来。自此以后，众多的炎黄子孙便生活在一种绳索羁绊的氛围中；中国社会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

“八·二九”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国耻日。炎黄子孙切莫忘记这一天！

## 二、罂粟之妖

说到“八·二九”外国强迫中国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不禁让人联想到一种名叫罂粟的小花。这种小花有鲜红、橙红、粉红、白色或黄色，以艳丽为其特质。而这种艳丽的小花，又进一步勾起中国人民多少饱含血泪的回忆，痛心疾首的愤慨。

罂粟是一种既能救人又能杀人的花儿。它有花有果有子。子能入药，果汁能提取麻醉剂和毒品。这毒品就叫鸦片，又叫阿芙蓉，俗名称大烟。这种令人可憎的东西，原先并不产于中国，也不是供人吸食的。它产于南欧和小亚细亚，一般被当作药材使用。由于它内含吗啡和生物碱，具有镇痛、镇咳、止泻等医疗功效，1767年以前的中国法律允许进口少量的鸦片。那时，经营这宗买卖的主要是葡萄牙人。但是，英国毒品贩子看得眼热，也插手这项贸易。于是乎，鸦片就像一股黑色的毒流，迅速冲击着古老的中华大地。随着吸食之风的弥漫，它已完全失去了医疗的作用。

“罂粟很有耐性。吸食过一次鸦片的人，肯定还会吸。鸦片懂得等待。”“一旦尝到鸦片的滋味之后，没有鸦片而活下去是很艰难的。”——法国著名作家科克托在《鸦片烟》一书中这样一针见血地写道。

吸食鸦片必上瘾——这话一点儿也不假。而一旦上瘾，瘾君子便完全成为鸦片的奴隶。尤其是抽鸦片后4至12小时，烟瘾发作而找不到鸦片时，瘾君子的感觉比死还难受，只有马上吸食才能消除痛苦。一份报告书这样说：“其症状为极度的心神不安、烦躁、全身发寒、脸上发烧、打喷嚏、出虚汗、淌口水、流鼻涕，有的人还有恶心、呕吐、腹泻等胃肠性不适。腹部、双腿和背部严重痉挛；全身骨头痛，肌肉抽搐；神经兴奋、发颤。每一种症状与其他症状相矛盾。烟瘾发作时，瘾君子很饿，但又吃不下；而且很困，却又睡不着觉”。倘若不及时戒烟，烟瘾还会愈来愈大，鸦片剂量也愈抽愈重。从而导致吸食者发生心理变态、性格变态、性变态等一系列难以医治的疾病。

吸食鸦片在人体生理上引起的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1836年，江苏一位文人对鸦片的危害就作了如下的描写：

吸烟耗尽人的生气；  
吸烟妨碍事业的正常进行；  
吸烟耗损了人的肉体；  
吸烟浪费了一切财产；  
吸烟使人相貌不扬；  
吸烟促进了淫猥；  
吸烟泄露了机密；  
吸烟触犯了刑律；  
吸烟伤害人的心肺；吸烟毁灭人的生命。

由于吸食鸦片成瘾难戒，有人还用相思的男女来比喻瘾君子对鸦片的依赖程度。于是，罂粟在中国诗人的笔下又被称作“相思草”。有个名叫王尚辰的写了一首题为《相思曲》的长诗，愤怒地谴责了鸦片的毒害：

炎荒瘴毒金蚕蛊，  
皂鴉（指鸦片）嘬人肌骨腐；  
磨脂滴血捣春华，  
搏就相思一块土。

相思土碎青烟飞，  
拌使内地输金钱；  
闾阎元气日浇薄，  
氤氲化作相思天。  
相思兮相思，  
朝暮无已时。  
但愿不识相思味，  
待到相思悔已迟。  
吁嗟乎！  
世间多少奇男子，  
一生甘为相思死。

在近代爱国诗人龚自珍的笔下，也有一首讽刺官僚们吸食鸦片丑态的诗。诗云：

鬼灯队队散秋萤，  
落魄参军泪眼荧。  
何不专城花县去？  
春眠寒食未曾醒。

诗人看到，当时一些官僚地主，已成为“鬼灯队队”的烟客，烟瘾发作时，他们涕泪交流，显出一副鬼样子！

从当时的情况看，吸食鸦片的现象起初还只是少数富家子弟。后来，这种嗜好传遍了社会各阶层——商人、政府官员、一般苦力以及妇女和僧尼道士也吸食起来。

据有人估计，在 1838 年前后，在京官中有十分之一、二，地方官中有十分之二、三吸食鸦片，至于“刑名、钱谷之幕友，则有十分之五、六；长随、吏胥，更不可以数计。”

士兵中吸食鸦片的风气也在蔓延。据吉林将军祥康透露，在沿海七省的士兵中，不抽鸦片者，简直寥寥无几。成千上万的武装士兵腰带上挂着鸦片烟筒，正如他们对待平常作为服装一部分的扇盒那样，毫不在乎。

一些外国观察家发现，在中国各大城市中，鸦片馆就像英国的杜松酒店一样普遍。

拿在“鞑鞑之下”的北京来说，不少鸦片烟馆是由在职官员开设的。

距京都咫尺之近的天津，文人们笔下的景象是：“烟馆林立”，“烟具陈列街前”。

至于天高皇帝远的各地方，更是无法无天。

一个瘾君子，一天究竟要吸食多少鸦片呢？

据时人包世臣的统计。当时一般吸鸦片者平均每天要在鸦片上耗银一钱（1/10 两），而鸦片的市价四倍于同样重量的银子。抽鸦片者每天平均需吸 2.5 分重（1/4 钱）的鸦片或 1.7 分的鸦片膏。

由于数千、数万、数百万枝烟枪既对着男人，也对着女人，既对着平民百姓，也对着达官贵人，在短短几十年内，不知有多少穷人、多少富人在这种枪口下慢慢地、慢慢地倒下去了……。

到 1835 年，中国吸食鸦片的人数已不下 200 万人，竟占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 1/66。

此事连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也感到：“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

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折磨他们的肉体”，鸦片贩子就像“贪得无厌的摩洛赫（古代人信奉的要用活人祭祀的神）时时刻刻要求给自己贡献更多的牺牲品……。”

一个美国传教士也说：“地球上，也许没有什么地方比那些邪恶的茅棚（指烟馆）的周围地区更接近于地狱了。”

当时，英属东印度公司几乎垄断了全部在华鸦片贸易。一个名叫格林堡的学者通过详细考察，这样写道：到1800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在中国推销鸦片的技术，发展到了完善的地步。”从1830年开始，英属印度政府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开辟了15个种植罂粟的新产区，制定了对超产农户的奖励办法，从而使孟加拉鸦片的生产和销售增加两倍以上。

据统计，1800至1820年，东印度公司和鸦片贩子用行贿为走私铺路，每年平均对华销售鸦片4244箱。1822至1830年，每年平均销售鸦片11804箱。1831至1838年，每年平均销售鸦片27557箱。

“鸦片同金子一样！”一个名叫泰勒的英国鸦片贩子这样说。

那么，可耻的鸦片贸易究竟能给英国资产阶级带来多大的利润呢？

以1835至1839年为例，鸦片收入每年1800万卢比，折合白银59.6万余两。

伦敦的“东印度与中国协会”主席、下院议员、资本家集团代表拉本德等人在1839年11月给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的信中情不自禁地谈到：自1837年7月1日到1838年6月30日，广州从英国进口货物中，仅鸦片一项就占了337万英镑，抵消了当年全部中国对英出口额314万英镑还有余。

正因为如此，英国政府和商界对鸦片走私历来采取一种包庇和欢迎的态度。

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在给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的训令中，曾直言不讳地提醒：“不要忽视这样的事实，他无权干预或阻挠英国在中国早已获得的鸦片贩运特权。”

英国资产阶级的孟买商会在《致大不列颠各地东印度与中国协会书》中，更恬不知耻地赞颂鸦片贸易说：“输出鸦片对于商务是有重大意义的，也就是把那个人口最多、资源最富的帝国的财富吸收出来，而用鸦片换来的白银，则使英属印度的大片土地喜气洋洋，人丁兴旺，也使得英国制品对印度斯坦的输出大为扩张，更使得这方面的海上航运与一般商务大为兴盛。并且，还给英属印度的国库带来一笔收入，其数超过整个孟买全省的田赋总额。”

在那些年代里，英国靠走私鸦片由穷光蛋变成百万富翁的不乏其例。有个叫维廉·查顿的苏格兰穷光棍汉，1820年远涉重洋来到广州，投身贩毒活动。八年后，人称“铁头老鼠”的查顿和另一个英国鸦片贩子马地臣合伙开设了一家拥有武装船队，年走私鸦片6000箱，可获利10万英镑的公司：查顿—马地臣公司。马地臣还在澳门创办了《广州纪事报》，每期都公开登刊鸦片的行市，广为宣传这项肮脏的贸易。时隔四年，亦即1832年，他俩又将这个公司扩大为怡和洋行。据查顿在其私人信件中透露：“在最好的年头，每箱鸦片毛利可高达1000银元。”他还无耻地夸耀，走私鸦片“是最安全和最有绅士气派的投机生意”。这两个强盗后来当选为国会议员，马地臣竟被封为爵士。英国资产阶级把他们视为“英雄”。

在查顿、马地臣一类毒贩、强盗大发不义之财的同时，中国的白银却日趋减少。据估计，1840年前的40年间，中国约有3亿至4亿元白银外流，

相当于当时货币流通总额的 1/5。用白银换来的黑色毒药则使吸食者——包括贵族、官僚、地主、商人、乃至宫廷太监、幕友、差役、轿夫、娼妓、优伶、僧尼道士、兵丁和农民的心灵和肌体受到极度摧残。人民群众视罂粟为“妖花”，比鸦片为“毒蛇”，斥走私船为“鬼船”，愤怒控诉西方列强“贩卖鸦片，毒我生灵，伤民命奚止数百万众，耗民财奚啻数千万金！”

### 三、林则徐销烟

到 19 世纪 30 年代中叶——当鸦片像一股黑色的毒流涌向中国，且呈泛滥之势时，坐在龙椅上的道光皇帝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了。

当时，有一名叫黄爵滋的京官注意到：以往的禁烟措施不外严密查访，在全部海岸扩大巡逻，并对鸦片窑口老板处以重罚。但是中国万余里海岸线，随处都能出入，真是防不胜防。更何况，烟贩和鸦片窑口之所以能够受到庇护，关键是因为有不少官员、稽查员和有权人士本身就是瘾君子。所以，黄爵滋认为，要遏止烟毒，最好的办法是先重治吸食，向瘾君子施加压力。

正是基于这种想法，他于 1838 年 6 月 2 日向道光皇帝呈上闻名全国的《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要求用死刑来严惩吸食鸦片者。

黄爵滋这样写道：

……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止，给予一年的期限“戒烟”。不管烟瘾多大，在这期间也能戒掉的。如果一年之后仍然吸食，那就是不奉法的乱民，应处以重刑。

按过去的法律，吸食鸦片者，罪仅枷、杖，……这都是“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所以甘犯明刑，不肯戒烟。

如果罪以列论，则临刑之“惨急”更甚于瘾，所以宁愿断瘾而死于家，必不愿受刑而死于市。……

严刑往往会累及无辜的民众，但吸食鸦片者是否有瘾，立即可以辨清。所以不会因重刑而产生弊害。……

爪哇人本来是轻捷善斗的种族，红毛人制造鸦片，诱使其吸食，因此精神大衰，终被征服。红毛人在本国有吸食鸦片者，则在众人环视之下，将该人绑于杆上，用炮击入海中，所以没有人敢吸食鸦片。……各国只有人制造鸦片，而无人吸食。……以外夷的力量都能令行禁止，何况我皇上雷霆之威，赫然震怒，则任何愚顽之人也会戒掉鸦片。

这样，既可防止白银外流，银价也不会上涨。然后研究理财之方，就会给天下万世臣民造福。

黄爵滋的这篇奏文写得极为出色。它深深地打动了皇帝的心。道光皇帝把这个奏折交给各省总督、巡抚以及盛京、吉林、黑龙江的将军“议奏”，渴望听听他们的意见。

10 月间，封疆大吏们的复奏陆续送到了皇帝的面前，但遗憾的是，在 28 份复奏中，赞成黄爵滋的观点的仅有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澎、四川总督苏廷玉、河南巡抚桂良等极少数人，而大部分要员仍主张按“定例”办事，认为对“吸食者论死”的做法太重。

不过，幸好林则徐等少数人的奏折颇有说服力。林则徐告诉皇帝，大病须下重药，对鸦片吸食者来说，只有“死罪二字，足以怵其心志。”如果再不禁绝鸦片，“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与此同时，林则徐还提出六项禁绝鸦片的建议，并附上两种戒烟断瘾的丸方、饮方，盼能颁布各省，以资疗治。

如人所知，兵和饷是清朝统治者的命根子。要是“无兵”可使，“无银”充饷，那将是一种什么局面！听了林则徐的话，道光皇帝不战而栗。他思忖再三，遂于 10 月 25 日发布逾旨，要求各省将军、督抚“振刷精神，力祛积

习”，“趁此整顿之时，同心合意，不分畛域，上紧查拿，毋得稍行松劲。……其贩运、开馆等犯，固应从重惩办，即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吸食不知悔改者，亦著一体查拿，分别办理。”

就在 25 日这一天，道光皇帝还首先从自己身边开刀，把皇族、宗室中吸鸦片的家伙拿出来示众：

革去亲侄儿庄亲王奕大的王爵，停发养赡钱粮两年；

剥夺辅国公溥喜的称号，也停发养赡钱粮两年；

三等伯爵贵明的爵位同时被削去。

10 月 28 日，又以“冒昧渎陈，殊属纰缪”为由，把两年前力主弛禁论（就是主张鸦片贸易合法化）的许乃济降为六品顶戴，并令其“即行休致”。

在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全国范围的禁烟运动迅速展开。

在广东，冯得圃等人因开设窑口、囤贩鸦片而被捕；

在福建，施猴等犯也因贩卖烟土被投入监狱；

在云南，下令禁种罂粟，并且惩办吸食鸦片的官吏；

在天津，大沽一带的洋船上，捕获烟贩邓然等犯，还起获鸦片 13.15 万两。

然而，道光皇帝清楚地知道，鸦片走私的根子在广州。因此，要禁绝鸦片，必须先铲除这个根。而要铲除这个根，又必须委派得力的大员去认真督办。于是，他于 11 月末宣令湖广总督林则徐进京商议。

12 月 26 日，林则徐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北京。第二天，皇帝便接见了。据透露，道光皇帝在谈到鸦片对臣民的毒害时曾流着泪对林说：“此孽不除，我有何面目见列祖列宗于九泉之下！”由于君臣谈得极为投机，道光皇帝竟连续召见他八次，并赏赐他骑马游览紫禁城。一个皇帝如此隆信、眷顾自己的巨工，是不多见的。

当 1838 年最后一天来临时，林则徐被委派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厉行禁烟。

诚如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钦差大臣的官印代表着皇帝的全部权力，只有在特殊或紧急的情况下才授予某个官员。而 1838 年除夕之日，道光皇帝把这种权力授与林则徐，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首先，从 19 世纪 20 年代起，这位皇帝就一直赏识林氏的才干、人品以及他对朝廷的忠心。据史载，林则徐曾以赤手空拳，不流一点血，一度消弭了一次农民起义而出名。那是 1828 年（道光八年）松江泛滥成灾，当地人民群众抗议，知府出动了军队。当时作为该知府的一个幕僚的林则徐，却只单独地驾一叶扁舟前往，同起义者面对面地讨论他们的冤情。从那以后，朝廷总是委派这位大员去对付特别困难的局面。当了江苏巡抚后，林氏又很快博得“林青天”之名。再者，道光皇帝还一直看中林则徐所写的奏折，尤其是 1838 年夏季那三份关于禁烟的复奏，更令这位当今圣上折服，以至禁不住用朱笔图画出许多精辟之处。因此，让林则徐担负起禁烟的重担是最恰当不过了。

“揭来衔命驾锋东，要与愚氓洗鴆毒。欲挽颓波力恐微，试想燎原害诚酷。”——这是林则徐赴粤途中寄友人的一首诗。它真实道出了这位钦差大臣其时复杂的心情。

林则徐为什么会感到“力恐微”呢？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此次使命非同一般，用他对好友沈鼎甫、姚春木、王冬书等人的话说，是“乃蹈汤火”，“身蹈危机”。

当然，林则徐的担心倒不是来自鸦片走私贩以及瘾君子的抵抗，而是气恼朝中军机大臣穆彰阿等传播禁论者的“忌阻”。林则徐始终忘不了在京期间，穆彰阿等常常对他面动难色，口出危言。

但是，林则徐毕竟是个爱国者。在他的价值观的天平上，个人的祸福荣辱终究难与民族利益划等号。所以，为了堵塞中国大患之源，除奸整溺，免毒流于四海，他决心“竭其愚悃”，置“祸福荣辱于度外”。

1839年（道光十九年）1月8日，林则徐启用钦差大臣官印，出京南下。据说，他坐乘十二人抬的大轿，随从只有一名管事、六个仆人和三名厨子，行李装在三辆大车上。事先，他就通知前方各站的地方官，不许他的随从向各站索取任何东西，因为他们已领取了饷钱和食宿费。他还通知说，为了“以节糜费”，各地方政府和驿站只须为他备办家常便饭，不许大张宴席，尤其不许搞燕窝烧烤之类。

如果说林则徐南下途中前半程还有点“力恐微”的感觉的话，那么行至江西，这种恐慌之感就一扫而光了。因为路经文天祥故乡时，两广总督邓廷桢和其他广东爱国官吏士绅，派人前来迎接他，并把广东军民斗志高昂的消息带给了他。他顿时振奋起来。特别令他高兴的是，上年12月12日，广州近万群众，自发掀起一场反击英美侵略者干涉中国禁烟的斗争。在这场斗争的鼓舞下，原来倾向弛禁的两广总督邓廷桢明确表示要“各扫疮痍，共培元气”，做到“普天率土处皆缉私之人，日日申禁烟之令”。这次他又写信向林则徐坦露道：誓“协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处于兴奋中的林钦差立即向广东发出了第一道禁烟令：将61名著名烟犯先行逮捕！这些人中，有的是多年来经营快蟹、扒龙的人，有的是衙门中纵容包庇贩卖鸦片的官弁。

1839年3月10日黎明，林则徐到达广州花地。当天上午，林则徐在天字码头的接官亭（现北京南路江边），受到广东官员的隆重欢迎。广州各界同胞，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一些外国人也坐上小帆船，窥探情况。有个美国人目击了当时的情景，描述说：“林钦差有庄严的风度，表情严肃而坚决。”

那里，广州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红棉绽开，万紫千红，群情高昂。林则徐看到这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了解到广东群众对侵略者“皆动公愤”的民情，就立即布置水师提督关天培，调遣兵船，把停泊在零丁洋面专门囤积鸦片烟的二十多艘英国趸船，严密监视起来。同时，他还呼吁广州各界人民——绅士、商人、军人、水手和农民——和他合作禁烟，并鼓励惯常吸烟者去掉他们的恶习，进而举例说有一个吸烟上瘾达30年之久的人，停止吸烟后，“则颜面发胖，筋力复强”。

在以后的一个星期内，林则徐完全忙于调查、会晤官员。他经常和高级官员一起进餐，其中有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海关总督豫坤、水师提督关天培。主要依靠郭桂船和梁廷枏的帮助，林则徐很快了解到了中外关系、鸦片贸易的细微情节。郭桂船当时是关部豫坤的书办，在林担任江苏巡抚时就十分仰慕他。梁廷枏是林则徐下榻的越华书院的监院。1838年海关监督命他编纂了有名的《粤海关志》。因其曾在海防书局任职，保存有许多外国请愿书、禁令、海岸战略要地地图、军事区和要塞规划，以及枪炮等武器图，郭桂船督促他选一些关于航海的重要文件，附上详细说明，送交林则徐。梁廷枏遂准备了大量材料，由郭桂船转交给林则徐。林则徐到广州后，一反惯例，立即造访梁廷枏，和他促膝长谈。

其时，不少洋人曾错误地认为，林则徐到广州引起的震波，一个星期就

会过去。因为他们的逻辑是：林氏的一些举动不过是给远在北京的皇帝看看而已。

然而，他们大错特错了。时隔9天，亦即3月17日，林则徐把当地一些行商、买办、通事召集到自己的官邸，一直询问到晚上。一位身临其境的人感到：林则徐提的问题很“深刻，切中要害”，“他了解情况之广之细，往往令众人吃惊”。

次日午后，林则徐又把所有行商召集到他的官邸进行长谈，并将两份钦差大臣文告分发给他们——一份是给行商的；另一份是让他们转给外商的。

在谈话中，林则徐严厉谴责了行商们的背叛行为。他说：“你们忘了朝廷对你们的养育之恩，竟然收纳汉奸为心腹，把政府准备做的每件事都预先透露给外国人，对政府询问外情则谎言以对。”他警告他们说，他的首要任务是惩办国贼，在行商中将有一两个被处死。

3月21日是林则徐规定缴出鸦片的最后一天。

这天上午，“外侨商会”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对付林则徐。

结果，外商们经过一翻密谋，决定损凑1036箱鸦片上缴，以图蒙混过关。

3月22日，林则徐接到外国鸦片贩子答应呈缴1036箱鸦片的呈报。但林则徐没有被这种象征性的姿态所蒙骗。他的答复是：“这只是些零头，还有好几万箱呢”。此刻，林则徐又得到广州知府、南海、番禺知县的报告：“闻得米利坚国夷人多愿缴烟，被港脚夷人颠地阻挠，因颠地所带烟土最多，意图免缴。”于是，他当机立断，下令传讯颠地。而“颠地自知久惯贩卖，不敢遽出见官”。

3月24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乘着由四名水兵划桨的“拉恩”号轻便快艇自澳门来到广州，准备帮助颠地逃走。这位来自苏格兰的皇家海军上校“确信坚决的语调和态度将会抑制广东省当局轻举妄动的气焰”。

但是，义律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到达广州的当天，林钦差已以外商未报鸦片，意在观望，下令把停泊在黄埔的各国船舰先行封舱，停止买卖。这样一来，义律想带领颠地潜逃的计划，立刻成为泡影。

鉴于义律的对抗行为，林则徐于24日当晚下令封锁商馆，把义律和320名鸦片贩子一起禁闭里面，并撤走一切仆役和买办，限期如实呈缴鸦片。

到3月27日，义律见无计可施，便于早晨6时宣布“以不列颠女王陛下政府的名义并代表政府，责令在广州的所有女王陛下的臣民，为了效忠女王政府，将他们各自掌管的鸦片即行缴出，以便转交中国政府，并将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船置于本人指挥之下，再速将各自手中英国人所有的鸦片开具清单，签章呈阅。……英商财产的证明及照本通知乐于缴出的一切英国人的鸦片价值，将由女王陛下政府随后规定原则及办法，予以决定。”第二天，又禀呈林则徐，说他“愿意严格地负责，忠诚而迅速地呈缴英商所有的鸦片20283箱”。

对于义律所提供的数字，林则徐诚恐不实，又找来几个华商和曾在水师做过事的人估计核实。据“称外夷高大趸船，每只所贮亦不越千箱之数，是趸船二十二只，核与报箱数不甚相悬”，这才放下心来。

当晚，林则徐又传见十三行总商伍绍荣等，盘问洋商在义律呈报缴烟过程中有否通同作弊，并严厉警告说：“汝为官商，倘有私许夷人以价而后设法赔补者，慎汝脑袋”！

4月2日，林则徐宣布虎门外的龙穴岛为缴烟地点，并酌定限制：鸦片

缴出四分之一，允许雇用买办、工役；缴到半数，量许舢板请牌，查验往来；缴到四分之三，准予开舱贸易；缴完，一切照常。

4月3日，林则徐最后修改酌定了经负责实际事务的官员反复研究后草拟的《收缴趸船烟土章程》，对缴烟的各个环节作了详细的规定。

4月9日晚，林则徐接到关天培从虎门来信，报告首批趸船已由九州洋开到龙穴候缴。第二天，他便和两广总督邓廷桢、海关总督豫坤出靖海门，登舟前赴虎门。经过一天一夜的航行，11日泊舟于虎门镇口。关天培前来迎接，并报告本日已收缴烟土50箱。

打这以后，缴烟工作顺逆相交。直到5月18日，22艘趸船的19187箱和2119袋鸦片全部缴来。按一袋鸦片的份量相当于一箱鸦片计算，林则徐实际上收缴了21306箱鸦片，“核之义律原禀，应缴20283箱之数，更溢收一千袋有零”。这些鸦片合计23万余斤。

缴出的鸦片都临时贮存在虎门镇口。林则徐等人本计划要把这些鸦片解往北京，后因途程遥远，担心路上被人偷漏抽换，道光皇帝便于5月30日命令林则徐就地“督率文武员弁，公同查核，目击烧毁，俾沿海居民及在粤夷人共见共闻，咸知震聩”。

林则徐接到上谕后，马上在虎门镇口村（现东莞县太平镇）海滩边修造了两个长宽各十五丈余的化烟池。

1839年（道光十九年）6月3日，这是值得中国人民纪念的日子。虎门寨下，搭起一座礼台，挂起麒麟帐，铺着红色的毡毯，山前山后，扎满绿营哨兵。礼台前面，挂着一面黄绫长幡，上面写着“钦差大臣奉旨查办广东海口事务大臣节制水陆各营总督部堂林”，威武雄壮，迎风飘舞。这天，雨后天晴，骄阳高挂。从四面八方来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午后二点左右，留有长髯，神情刚毅的林则徐，在怡良等人的陪同下登上礼台。林则徐遥望南天，心潮澎湃，他庄严下令销烟。顿时，隆隆的礼炮声威震海空，站在两个销烟池旁的兵丁们忙碌起来了。先是从水沟里把水车入销烟池内，加入食盐，使池水成为盐卤，然后把一箱箱的鸦片运到池边，打开烟箱，将鸦片切开捣碎，投入池中，泡浸了一些时候，再撒下烧透了的石灰，顷刻间，盐卤沸腾起来，浓烟滚滚，升入天际。兵丁们手拿铁锄木耙来回翻搅，使鸦片完全消溶，等到海水退潮时，打开销烟池的涵洞，使鸦片随着浪花冲入大海；在涵洞上还装着网筛，防止未消溶的大块鸦片流出。看到这一切扬眉吐气的情景，人群中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

为了让外国人“共见共闻”，6月13日，林则徐发出告示，准许外国人到现场参观。

一些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参观后惊叹道：“我们反复考察烧烟的每一个过程，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的细心和忠实程度，远远地出于我们的意料之外，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个工作更加忠实的了。”

一个名叫卫三畏的美国传教士当时也在场，事后他这样写道：“鸦片是在最彻底的手段下被销毁了，……在世界史中，一个非基督教的君主宁愿销毁损害他的臣民的东西，而不愿出售它来装满自己的腰包，这是唯一的一个实例。全部事务的处理，在人类历史也必将永远是一个最为卓越的事件。”

虎门销烟的壮举，一直持续了22天，到6月25日才结束。除留下8箱作为样品送往京城外，23万余斤鸦片全部被销毁。它像海水冲刷烟膏那样，洗去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强加给中华民族的耻辱，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

决心禁烟和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意志，谱写了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第一页光辉篇章。

今天矗立在首都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第一幅浮雕所表现的就是当年虎门销烟的动人画面。

#### 四、长矛与炮舰的较量

“中国的禁烟运动给了我们一个战争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终于乘战胜之余威，提出我们自己的条件，强迫中国接收。”其时，伦敦、曼彻斯特等地的传闻媒介竟这样叫嚣道。

那些在华烟贩子更是催促自己的政府“对中国实行迅雷不及掩耳的沉重打击”。

果然，英国政府采取行动了。9月21日，当外交大臣帕麦斯顿接到义律从中国写来的要求“动用武力”的报告后，立即表示：对付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

1840年新年过后的第16天，时年22岁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在议会进行了一次演说，她声明禁烟事件使英商利益蒙受损失，并且影响英王“尊严”，所以她正予以密切的注意。这篇演说词对外公开了英国政府发动侵华战争的决心，同时也愈加鼓励了整个统治阶级的侵略意向。

2月20日，帕麦斯顿发出训令，任命曾任印度总督、英国好望角舰队总司令官的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并任命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

就在同一天，帕麦斯顿又发出一件致中国政府的照会，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赔偿烟价（隐其名曰“货价”），割让岛屿，偿还商欠等无理要求，并声明英国侵略军此次军费，全部由中国负担。帕麦斯顿还恫吓道：如不全部接受上述要求，英国必定“相战不息”。帕麦斯顿2月20日致中国政府的照会，实际上就是不列颠政府对中国的最后通牒。

可悲的是，当改变中国命运的鸦片战争爆发时，妄自尊大，不谙外情的清廷却对自己对手的情况知之甚少。在御前会议上竟向大臣们连发数问：英吉利在何方？方圆几许？距中国多远？女王是否婚配？众大臣则面面相觑，语焉不详。

诚如某些学者所论证的那样，就当时的军事装备和军队素质而言，优势显然在英国一方。其时，号称海军强国的大英帝国，拥有像“复仇女神”号那些最新式的铁甲舰，这种炮舰能够很容易地把炮口转向任何一个攻击目标。英军配备的野战炮射击既准确，杀伤力也极强。步兵的滑膛燧发枪本来就比中国的火绳枪有效得多，何况这时又被有击发装置的滑膛枪所代替（滑膛枪的有效射程为300米左右）。英军的战术也比较好。他们倚仗船坚炮利，在海上任意往来，他们决定着战争的时间、方向、规模。他们愿意在什么时候打，就可以在什么时候打，愿意在哪里打，就可以在哪里打。尤其是针对当时清军只注意坚守沿岸固定的要塞阵地，炮口固定在朝向敌人从正面发动主攻方向的弱点，英国士兵能在海军炮火支援下，以密集队形从侧翼攻击来夺取炮台或者突破敌方阵线。

与英军相比，清军的装备极为落后。清统治者长期把骑射奉为“祖训”，因此弓矢、矛戟、刀斧、椎挺是清军使用的常规武器。直到1836年才提出“军储利器，枪炮为先”，但又强调“枪箭并重，不容偏废”。军队的素质也极差。八旗兵在入关前后骁勇善战，但世袭之后迅速腐化。绿营军虽然分为陆军和水师，由各省统帅指挥，但实际上没有十足的兵力。花名册上尽是弄虚作假；为了应付点卯，就匆忙地招募市场的苦力；虽也定期军训，但重在观瞻而不讲究实际，注意搞戏剧舞蹈的剑术程式动作。每当发动大战役时，常

常由毫无所知的文官来担当统帅。在实际战斗中，这支队伍不是开小差就是劫掠农村。

尤其是水师，更难与英国海军相比。

1840年6月下旬，英国远征军陆续到达广州东海面。

英国开战的理由不是说因为本国臣民的财产被剥夺，生命受到威胁，女皇陛下的官吏遭到了侮辱吗？而列举的“暴行”又都是以林钦差为首的广州高级官员干的。所以，当时人们普遍以为英国远征军将首先进攻广州，对林则徐施行报复。

然而，英国政府给这支侵略军的指示却是：第一步先封锁珠江口，然后北上占领舟山群岛——直至到达天津，以威迫清廷接受赔偿烟款、割让岛屿、开埠通商等一系列侵略要求。

英军为什么要避开广州，仅对其实行封锁呢？道理很简单，为了不挫伤锐气，首战选定的地点理应是一个既重要而又不会进行苦战的地方。而广州一带，林则徐的防御是极为坚固的。

还在上年厉行禁烟的同时，林则徐就意识到自己的对手“欺弱畏强”。为了防止不测，他接受邓廷桢、关天培的建议，在虎门海口武山、横档山之间的江面最狭处，安设两道横江木排铁链，用以堵截入侵敌船。稍后，他还购置和仿制西洋大炮，使虎门炮台的大炮增至三百余门。

为了能够真正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林则徐还在广州设立翻译馆，组织翻译人才，翻译外国书报，了解国际形势，把积累的材料编成《四洲志》等书。这些书叙述各国历史、疆域、政治情况，成为了解近代西方最早的著作。

尤其可贵的是，林则徐在备战御侮时，相信“民心可用”。他根据英人藐视水师、害怕渔民的这一情况，招募渔民、旦户丁壮五千人，编为水勇，授以火船，精练夜袭火攻之法。后又发布告示，宣布：“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

正因为广州一带布防严密，英军感到无隙可乘，所以才留下都鲁1号等四艘军舰和一般武装汽船对其实行封锁，而主力则进逼舟山。

7月3日，英国主力舰队驶抵舟山海域。

6日凌晨，英军攻陷了定海城。当他们占领炮台时，一看那里的大炮上铸有制造年代和铸造者的姓名，不觉轻松地吹起了口哨。原来那些大炮已经服役240年了，这种老掉牙的东西，仍在近代战争中派上用场，真是一幕悲剧。

此刻，林则徐最担心皇帝会发生动摇。但正如林则徐担心的那样，当英国巨舰群继续北上，于8月6日来到天津洋面大沽口外时，朝中立刻乱了阵脚。

当时，天津由直隶总督管辖。直隶总督是有名的弛禁论者琦善。8月25日，懿律把帕麦斯顿的一封信交给了琦善。这封信首先攻击了林则徐的禁烟措施，说该官“轻视大英国家特委管理领事”，并“强迫凌辱该领事”，所以“大英国决讨昭雪”。接着，要求：赔偿在广东没收、销毁的鸦片价款；

对英国商务监督所施加的侮辱谢罪，并保证将来不再有类似的情况；指定沿海一个或数个岛屿作为英国臣民居住和进行商业活动的场所；全部偿还公行商人欠英商的债款；负担英国远征的军费。

道光皇帝见到琦善呈上来的这封信后，立刻闪过把林则徐作为替罪羊的

念头。

8月30日，琦善在与义律长达6小时的会谈中，“坦白地承认英国人是受虐待了”，英国人要在“广州图报复而惩罚林，也是林应得之咎”。琦善还死乞百赖地要求：“这是在广东发生的事情，还是在广东谈判吧。”由于琦善又通过他的助手白含章告诉英人，琦善已“被任命为全权大臣，要到广州去调查并申洗……委曲”，懿律兄弟终于同意南下广东谈判。

英军一起航南下，道光皇帝以为琦善“片言片纸，连胜十万之师”，只要惩罚林则徐，替英国人“申冤”，便可完事大吉。于是，在9月28日正式下令把林则徐撤职查办。

11月29日，琦善带着钦差大臣的官印来到了广州。他一到这里，就把林则徐以前所采取的措施全部颠倒过来。

琦善的做法，意在取悦“英夷”，可英人毫不客气，他们的条件依旧。

由于英方意识到他们的要求通过谈判难以得到满意的结果，于是决定再次挑起战事。

1841年新年过后的第7天上午，英军攻陷了沙角炮台（即穿鼻炮台）和大角炮台。1月21日，琦善同意了义律提出的《穿鼻条约》。但当这个草约报请审批时，两国政府都不愿意接受。

在清廷看来，“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予香港”，成何体统。于是，下令逮捕琦善。犯有欺君之罪的琦善不得不戴着镣铐离开广州。

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看了义律的报告，也拍着桌子大发雷霆。这位战争贩子的逻辑是，英军既然占领了舟山，何必用这个重要基地来换取那个干燥多石的岛屿香港呢？对于义律发布公告一事，帕麦斯顿也颇为不满。他致函义律说：“在你和琦善之间，对于割让香港一节，并不是像签订了任何正式条约，而且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断言在你发布通告的时候，这种条约即使经琦善签字，也绝不是已经由皇帝批准的；因此你的通告全然是为时太早。”

此后，义律被亨利·璞鼎查所代替。

5月24日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生日。英军选定这一天再次进攻广州。

其时，镇守广州的是皇侄奕山以及户部尚书隆文和70岁高龄的湖南提督杨芳。只坚持了两天，奕山便可耻地在城上竖起投降的白旗。几乎没有经过任何讨价还价，《广州和约》就于5月27日诞生。它赫然写道：奕山、隆文、杨芳及外省军队，在六日之内撤至城外六十英里处；中国当局向英军交付六百万两。

这实际上是无条件投降！

按照英国人当时的策略，他们假惺惺不愿意与中国的百姓为敌。因此，初到广东时，曾用汉文发布一个声明书：“向中国人民保证，这次远征对于和平居民并无恶意，远征完全由于林则徐的虐待英人而起，大军所攻击的，仅仅是政府的官员、军官以及兵士”。他们满以为这样就能把仇视清廷的广大人民拉到自己一边来。但是中国人民不信他们这种骗人的鬼话。因为他们一侵入中国就始终与和平的居民为敌。再说，凡有一点爱国心的炎黄子孙，岂能容忍洋鬼子在自己的土地上横行霸道。

那是广州和约签订后的第三天，不少英军到广州城郊三元里一带烧杀抢劫，奸淫掳掠，甚至挖坟掘墓，抢劫死人身上的东西。侵略军的暴行以及清廷官吏无耻投降的丑态，激起了三元里人民的强烈怒火。当场有几名英军被

打死。其余英军见势不妙，抱头鼠窜，逃回四方炮台。5月30日拂晓，三元里等各乡群众竖起平英团大旗，主动向英军占领的四方炮台攻击。一个身临其境的英国军官曾这样描述过：“一大群一大群的敌人集合在军营的后面，以长矛、盾牌和剑为主要的武器。……敌人散布在一英里以上的地面上，大约有五千人之众，……两小时以内，敌人增加到七千人以上，露出许多军旗和几枝火绳枪。”英军司令卧乌古除留部分侵略军防守四方炮台外，亲率一千多名英军向三元里进犯。农民群众则采取诱敌深入之策，且战且退，等把英军引到牛栏岗一带时，迅速将其分割包围起来。英军发现苗头不对，马上下令后撤，但已来不及了。只见平英团的健儿们挥起大刀、长矛、铁锹、木棒、石块，排山倒海地冲杀下来，一时满山旗帜，遍地锣声。对于这种壮丽场面，曾经亲自参加过战斗的林福祥在《三元里打仗日记》中记述道：103乡人民群众“执旗继至。不转眼间，来会者众数万，刀斧犁锄，在手即成武器，儿童妇女，喊声亦助兵威，斯时也，重重叠叠，遍地野山，已将夷兵围在核心”。当天，英军少校毕霞等多人被击毙，不少英国士兵感到“可怕到了极点”。31日，英军头目义律率兵来救，也被围困在里面。后来，只是由于卖国贼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和南海和县梁星来替英军说情（用欺骗等手段），侵略者才得以在唾骂声中逃去。

这场斗争在中国近代史上显示了只有在广大人民中才存在着反对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力量。

8月10日，执行帕麦斯顿训令的英国新任侵华全权公使璞鼎查来到香港。随同他来的还有一支取道印度洋和从新加坡来的远征军。

为了使自己的主子——帕麦斯顿的训令尽快变成现实，璞鼎查立刻马不停蹄地率领侵华海军司令巴尔克少将、陆军司令卧乌古少将，以及军舰26艘，陆军3500人北犯。

于是，8月26日，英军攻陷厦门；10月1日至13日，连陷定海、镇海和宁波；这以后，又再攻取乍浦、吴淞口、镇江等地，直至把战火烧到南京，迫使清廷代表在炮口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 五、一个任切割的“大西瓜”

“幅员辽阔的中华帝国的政府是值得称道的，它是令人畏惧、荣誉和道德三者的混合物”——这是 16、17 世纪时，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直至 18 世纪，西方上流社会还把中国当作学习、模仿的对象。在法国，18 世纪的第一个元旦，王室举办化妆舞会，参加者竟不约而同地化妆成中国人，以显示自己的情操高雅。1756 年春分那天，法王路易十四，仿照康熙皇帝，扶犁扬鞭，下地耕种，昭示老百姓勤奋劳作，以慰天灵。1793 年底，英国使团的马戛尔尼从中国带回一册绘有假山、石景的图画，英国人见了无不欣赏，纷纷在庭院中堆砌假山石景，于是在建筑、家具、陈设上装饰的中国山水、花草、虫鸟图纹的图案画风靡欧洲。欧洲人为什么这般崇尚中国呢？借用西方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的话：“耶稣基督世界和这一古老社会相比”，“显得黯然失色。”中国人用自身道德伦理来协调人间世物，远比欧洲各国由“上帝”来支配要进步得多，中国的文明程度要比罗马教廷统治下的欧洲高得多。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国曾创造了灿若星辰的众多的“世界第一”。可是，经过中英鸦片战争，——中国一触即溃、俯首求和的现实，使中国的形象一落千丈，而西方人很快便以傲慢的神情来看待中国。一个英国军官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写道：“中国是个长期愚昧而又骄傲的国家，是一个没有自我更新能力和缺乏活力的国家。”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在参加这场不义战争后也曾断言：“中国的龙要被废止，只有基督教义才能拯救这已经‘死去’的文明国家。”

“中国的龙要被废止”了。西方列强已把它看作一个大西瓜。既然它有皮、有肉、有水、有籽儿，那么，或多或少，或厚或薄，大家都有份儿切它、啃它……。

不是么？

这场战争本来是中英两国之间的冲突，与其他国家毫不相干。但是，美国和法国也乘人之危，相继签订了《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从中国勒索了不少好处。紧接着，葡萄牙、普鲁士、比利时、西班牙、荷兰、挪威、瑞典、丹麦等国也纷至沓来，都“分享快乐”，与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总之，这些看热闹的，不论是靠得近的还是站得远的，都想涌上来狠狠地咬中国一口，踹中国一脚。

说到美、法等国乘人之危，从中国勒索好处，人们必然会首先想到《南京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亦即 1843 年 7 月 22 日和 10 月 8 日，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与清廷代表耆英通过继续“商谈”，分别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作为对《南京条约》的补充。

因《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是在虎门签订的，所以又称《虎门条约》。《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虽然公布地点是香港，但有的人也把它视为《虎门条约》的一部分。

通过这两个补充条约，作为战胜的大英帝国，又从中国攫取了如下的几项主要特权：

片面最惠国待遇。《虎门条约》第 8 条中赫然写道：中国如“准西洋各外国商人一体赴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港口贸易，英国毫无靳惜。但各国既与英人无异，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

正是根据这种片面最惠国待遇，各侵略国彼此间建立了“利益均沾”的制度，即任何一国从中国取得的某种利益，其他国家都能一体享受。难怪一个美国商人要赤裸裸地对他的英国同行讲：“我们不反对你们，你们只管去捞取好处，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分享这个好处。”

领事裁判权。《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中第13条规定，凡是中国人与英国人“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即定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

据此，外国人在华即使犯了罪，也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凡是涉及外国人的民事刑事案件，均由外国领事来审理。于是，那些无恶不作的海盗或无本生利的商人，一旦踏上中国这块“乐土”，便可如履坦途，无所顾忌，随意探囊取物。此事连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列维廉也感到：“向中国勒索领事裁判权，乃是一桩无耻之尤之事，其恶劣程度不下于苦力贸易和鸦片贸易。”

规定“值百抽五”的关税税率。1842年8月29日签订的《南京条约》第10条中曾明确规定，中国海关无权确定进出口货物的税率，必须与英国共同商定。《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中则把190种左右的进出口货物，分类开列应完税则，且将关税税率定在5%左右。这就为15年后英国在《天津条约》中强行规定“每价百两征税五两”的固定关税打好了基础。

所定“值百抽五”的关税税率是极低的。请听听一位曾在中国海关当了四十五年总税务司的英人赫德的一段自供辞吧：“今天外国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这用不着搜罗细节或堆砌数字就能作出这样的描述：他们只要……交纳5%的关税，就能通过……条约口岸中的任何一个口岸，运进洋货或输出土产；他们只要再交纳进口税额一半，作为子口税，就能把洋货运至内地和由内地运出土货。他们还可以把中国的产品从一条约口岸运到另一条约口岸，只要运出时交纳出口正税，运进时交纳（进口）半税。在他们居留的条约口岸，他们免纳所有的地方课税。他们可以免税运进他们个人和家庭需要的任何物品。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不受中国的管辖，而把自己置于本国官员即领管管辖之下。……他们的行动自由，不受任何限制。这些，简单地说，就是外国商人在中国所处的地位。”

英国军舰可以常驻中国港口。《虎门条约》第10条规定：“凡通商五港口，必须有英国官船一只在彼湾泊，以便将各货船上水手严行约束，该管事官亦藉以约束英商及属国商人。……其官船将去之时，必另有一只接代。……凡有此等官船到中国时，中国兵船不得拦阻。”所谓“官船”，即指军舰。允许“官船”停泊每一个通商口岸，这就开创了外国兵船可以自由地进入中国领海和内河的恶例。那些常驻中国通商口岸的军舰，既是武力干涉中国内政、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工具，也是进一步向中国挑衅、勒索的重要筹码。

英人可以在条约口岸租地建屋居住。《虎门条约》第7条规定：“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交准英人租赁。”当时，清朝官员满以为这一规定可以避免口岸上的纠纷，可万万没想到“洋人”利用这个条文在各通商口岸划定居住地区，造成事实上后患无穷的“租界”制度。

维多利亚女王在向国会报告关于中英之间不平等条约的问题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我和中国政府交涉的全过程中，我一直表示无意取得任何独

享的利益。我的愿望是对各国的商业应一视同仁。”

果然，仅仅相隔一年，即 1844 年（道光二十四年）7 月 3 日，美国代表顾盛便与清廷代表耆英在澳门界栅外望厦村签定了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

该条约共计 34 款，除了没有割地赔款以外，不仅全部继承英国侵略者在《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和《虎门条约》中所享受的一切特权，而且对这些特权作了更确凿的规定，并加以扩大化，新增了不少新的特权和利益。

相对英国来说，美国扩大的主要特权有：

领事裁判权：除继承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第 13 条规定——双方人民争执各依本国例治罪一般限于刑事范围外，《望厦条约》则把这些争执确定并扩大为既包括刑事的争斗、词讼、交涉，又包括民事因财产或人身权利涉讼等两方面的事件；并将此项规定扩大到其他外侨，“若合众国民人在中国与别国贸易之人因事争论者，应听两造查照各本国所立条约办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

协定关税方面：《南京条约》第 10 条只言税率“秉公议定”，《望厦条约》第 2 条则确定成为“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就是说，要得到美国领事的同意，才能变更税率。此外，在《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中，英国领事有保证关税的征收和取缔走私的责任，而在《望厦条约》中，却解脱了美国领事在这方面的责任，使走私漏税更加猖狂。

允许“洋员”在港口引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第 1 条写道：“雇募引水工价若干，应按各口水程远近、平险，分别多寡，即由英国派出管事官秉公议定酌给。”而《望厦条约》第 8 条又进一步载明：“凡合众国民人贸易船只进口，准其自雇引水。”人所共知，引水也是一个国家维护其尊严和国防机密，保障港口和船舶安全的一项重要主权。结果，自此以后，在中国广阔的水域上，到处可见“洋员”引水，中国国防无秘密可言。

新增的特权和利益包括：

商船如不卸货，得在五口中的任何一口停留两天，毋庸缴税；

既经缴纳吨税，商船得前往另一口岸，毋庸重纳；

货物既经起岸并已完纳关税，得转装另一口岸，并于进口时凭海关证件免税通关；

准聘用中国人充任外国人的教习和采购书籍；

自签订之日起十二年后，得重新考虑修约。

这五点，是中英几项条约中所没有的。

对于这个条约，美方极为满意。美国总统泰勒在 1845 年（道光二十五年）1 月 23 日致国会的咨文中毫不掩饰地说道：“《望厦条约》已将美国对华关系，放置在一个崭新的立脚点上，万分有利于美国商务以及其它利益的发展。”

一个名叫丹涅特的美国学者则更明确地指出：

作为经营贸易的基础来说，美国条约比亨利·璞鼎查爵士所缔结的各协定，要高明得多；而且如此的高明，以致它立即变成为几个星期之后议定法国条约取法的典型，也变成 1847 年 3 月 29 日签订的对挪威和瑞典条约的蓝本。美国条约中高明地规定，也随即赢得英国人的承认，并且大加利用。诚然顾盛的条约已经变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的基础，直到 1856 年才为《天津条

约》所代替。

就像丹涅特说的那样，随着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法国也以其为“蓝本”，在“几个星期之后”——1844年10月24日，在广州黄埔的一艘法国兵船——“阿吉默特”号上，诱迫清廷代表签订了《黄埔条约》。这个条约共计36款。凡是英美侵略者从中国勒索去的特权和利益，法国侵略者全部做到了“利益均沾”。

除此之外，法国还攫取到传教的特权。该约第22条载明：法兰西人可在条约口岸“建造礼拜堂”，“倘有中国人将法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这样一来，中国政府便有了保护教堂的义务，而外国侵略者利用传教权利从事公开的侵华活动也由此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对于这一条规定，不独法国的传教士，包括英、美传教士，无不欢欣鼓舞。

此时的中国已经用“法”的形式被迫对外开放了。借用那位美国学者丹涅特的话说，当时的中国无疑是西方冒险家的乐园：

“各口岸的开放，和对新贸易的无限的期待，招得世界各地的冒险家纷至沓来，这些人除去靠他们的机智（实际是“海盗式的掠夺”——引者）为生而外，别无任何行当或职业。……旧金山港那些私自潜逃的水手们则被用酒灌醉之后诱充为水手，可是他们一旦到达上海，便又立刻潜逃，流散在沿海各处，企求过他们在外国所能过的最好的生活。

这是通商口岸的荒乱年月——人人都深感不安，中国人更是心怀危惧。在美国领事们的报告和委员们的公函中，像这类浪人的丑事、罪行和种种穷凶极恶勾当的记述，是不胜枚举的。例如，马沙利委员在1853年报告如下：‘目前在这个口岸（上海），岸上至少有一百五十名水手，其中各国人都有，他们不分昼夜，跑进中国县城去喝酒、滋事，闹得鸡犬不宁。他们之所以胆敢玩视一切法律，因为他们已经领教过监狱了，深知那里根本拘禁不住他们。’”

由于当时的中国已成为外国冒险家的乐园，众多的炎黄子孙怎能不满怀忧患，去想象父母之邦日后更加难忍艰熬的岁岁月月……于是乎，“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便成为近百年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两项神圣使命，直到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进南京城，在签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的地方，把那块“半殖民半封建”的牌子摘下来，砸得粉碎为止。

